

学术论评

评图书馆研究方向的历史性进展

徐人英

研究的历史活动就象人类的历史活动一样，必须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进行，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研究。图书馆研究方向的研究也不例外，要建立在现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而新的研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突破，否则，研究工作就陷入到封闭圆圈式的研究之中。图书馆研究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不同历史时期研究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目前，图书馆研究又面临一次新的历史性的发展，其意义之深远和影响之广泛超过以往的全部发展。

研究的历史活动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发展过程，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都有历史局限性，后来人要善于纠正。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高等学校图书馆专业基础教材——《图书馆学基础》中，我们看到了当前研究工作的严重缺陷，这就是把我国图书馆工作研究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方法”，其中主要的又是“着重研究图书馆工作诸过程的内容和技术方法”。这种认识和实践，使当前的图书馆研究方向被束缚在图书馆内部，造成图书馆与社会的联系、关系脱节。从固有的工作内容和过程出发进行研究，意

味着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从一开始就逻辑先验地被设定为一个有限范围，即限定在只能是而不能超出的某个社会机构内部的诸工作过程上，研究的思维方式严重地被束缚住了，而任何的思维方式都是建立在对客体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总是对已有观点、理论、知识的有秩序的使用和有目的的运用。所以，以往研究的思维形式就极大地阻碍着改革所要求的思维方式的超前变革，研究的思维方式非但未能超前，甚至被惰性力吸引到图书馆自身研究产生的孤立性上，这就严重地限制了图书馆研究的进展和图书馆工作的自身的发展。实际上，从发展观点看问题，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现象领域，它也有一个自身发展的过程，即一定的对象反映一定时期的科学学科发达程度，并受到这个时期人们总的认识水平的制约。现象领域发生变化是由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认识水平也提高了。这些发展、变化决定了研究原现象领域的科学学科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换言之，决不能脱离事物发展变化的具体性来谈论事物的概念。从这个道理中不难看出，图书馆研究方向的变化既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历史的这种进步首先表现为一般的思维超前。所以从当前的研究中产生出把图书馆从图书馆学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和把我们的研究从图

书馆及其现有业务中解放出来的思维活动。

在这里,思维方式十分重要,它被视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先验框架”。从思维出发,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从静态方面或动态方面作分析的考察。静态分析,就是暂时抽掉时间的因素,侧重从空间关系上考察对象。我们从静态角度观察图书馆,展现在面前的是错综复杂的空间结构形式——知识载体和图书馆,图书馆和读者等。收藏、流通就是反映图书馆空间地位以及图书馆空间结构的范畴。动态分析,就是联系事物的时间因素,把事物作为发展中的连续过程来考察,表现为空间结构世代前后相继的时间关系,即藏书楼、公共图书馆、现代图书馆等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果仅限于空间上的静态考察,就会丧失应有的历史感,无从了解社会现象的历史性、暂时性、重复性、阶段性以及不可逆转的方向性等等。而且,历史发展的空间也是历史时间的凝固和结晶,即只有在变动着的社会中对事物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找到将事物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环节。因此,静态分析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即是把动态分析与动态中的静态分析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以往图书馆研究的历史。这是比较正确的思维方式。

二:(1)

有了上面的认识,我们就能进一步分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变化与图书馆研究方向的历史性进展。图书馆研究就是对图书馆过程这个社会现象的研究,其中,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怎样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一般说来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它们既相互一致,也有相互不一致的时候。图书馆学这一名称及其对图书馆学对象进行研究是一个历史现象,早在1807年,西廷格就意识到关于图书馆的知识已经丰富到能从中抽象出一点

儿什么来的程度,他对之进行思维并第一次使用了“图书馆学”这个概念。在我国,本世纪初才出现关于图书馆研究的著述,发展至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而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也相应地有过三次或明显或不明显的转换。较早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被界定为“三要素”或“五要素”,基本上是从静态方面对图书馆作分析的考察的,带有明显的研究工作初期阶段所具有的特征。比如,采取形而上学方法,抓住组成图书馆整体的若干基本成分,把整体割裂成部分,以为这些部分并列在一起就是整体等。“形而上学”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所以恩格斯说:

“形而上学——关于事物的科学——不是关于运动的科学”〔1〕,以“不是关于运动的科学”作为指导方法去研究事物的运动,当然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性。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产生的变化”〔2〕,这就使得“要素”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但是,现阶段人们对图书馆整体各个部分的研究,虽然仍需深化,并有待于吸取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但它却完全不同于“要素说”阶段的研究了,对要素的研究不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更好认识整体的手段,而且,对研究工作还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能因为研究要素一叶遮目,让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束缚了视线,我们是在动态中研究静态的,如果再“把事物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就是历史运动的倒退。在图书馆研究的初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诸要素,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则是图书馆自身,主要是单个图书馆的各个组成部分。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进展到第二个阶段,是从图书馆现象领域中抽象、提炼一个“特殊的矛盾”。分析矛盾已经不再是单纯切割

事物，它从分析变化到综合，是建立在分析基础之上的综合研究。“书、人和法”是图书馆的直接存在，对之进行认识是感性认识。矛盾诸说如“藏与用”、“收藏与提供”、“系统收藏与反复提供”则具有对感性材料进行意识的性质，就是说，对感性内容进行“我的”思想，而“我们所意识到的情绪、直观、欲望、意志等规定，一般被称为表象”〔3〕。显然，“藏”是从直接存在着的书中抽象出来的表象，“用”是从直接存在着的读者借还中抽象出来的表象，藏与用矛盾只是被初步意识到的一个事实。表象比感性认识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更接近于理性认识，但它只是概括感性材料的最简单的形式，还不能揭露事物的本质。列宁说：“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4〕，还有待于把表象转化、提升或者“翻译”为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我们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为此，必须对表象进行“后思”，但这个“后思”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反复思索，而是把事物放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放在与其它事物的关系之中认识。苏联图书馆学家O·C·丘巴梁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地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5〕很有见地，这就是说，他主张把图书馆放在社会关系中进行认识，并且从“交流社会思想”（包括学术思想）角度去作分析的考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由感性认识上升到表象、由要素变化为矛盾之后，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尽管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换，但基本上仍然集中在图书馆自身，放在图书馆工作诸过程的内容和技术方法上。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对单个事物进行研究仍然是实际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说明旧思维方式具有巨大的保守力量，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并没有因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由感性内容上升到表象而发生有意识的变化，因此也没有把对工作诸过程的研究引导到解决特殊矛盾的轨道上。图书馆研究方向的转变是微弱的，主要表现为重

视读者这个因素。“读者服务”开始占据较重要位置，并且，通过读者的要求感觉到社会对图书馆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渐而有了压力感，意识到藏是为了用，产生比以前广泛得多的诸如参考咨询工作或部门，以及其它读者工作等。总之，图书馆研究方向开始向“读者服务”转换了，但是，它仍被强大的图书馆工作诸内容的研究掩盖着。

当前，图书馆研究即将发生新的进展，在这个发展时期的前期，图书馆研究浪潮中值得注意的有代表二个极端思想的二股潮流：一是无所做为的思想，不愿意进行深刻思维，只是从图书馆现状中看到绝大多数工作是简单的、机械的劳动，或者是简单技术性或程序性工作，出现了怀疑图书馆研究工作是否称得上“研究”或“科学”；一是本身缺乏深思，却自以为创立了证明图书馆学不断发展、成熟的体系，他们运用形而上学方法把图书馆研究表面化，把对图书馆进行切割、细分以为就是深入，“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6〕，殊不知“如果我们试用谓词的方式以表达真理，则我们的思维便不禁感觉到这些名言无法穷尽对象的意义”〔7〕，于是，图书馆哲学、图书馆法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工程系统学、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电子学、图书馆协作学、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语言学等分支学科应运而生，还有什么图书馆色彩学、图书馆美学，以及许多凡能涉及的学科都冠之以图书馆学称谓。难道这些就穷尽了体系的意义了吗？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学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发展成为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的呢？它们又将如何在事物内运动并发展自身呢？产生的分支学科越多就越不能建立图书馆学已经发展成熟到构成一种科学体系的权威。相反，这“聊以自慰”或“自欺欺人”的体系掩盖着研究工作中的真正贫乏。此外，研究主要的“成果”是“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

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

〔8〕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规律说。规律是现象的本质的联系，它首先是关系，是关于现象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可是，规律说并没有就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作进一步的阐述，那么规律说所指的“规律”就是一种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一种“虚空”。图书馆现象是具体事物，它就是多样性的统一体，这些多样性的东西彼此之间相互联系，而多样性的统一、联系在结构上区分为二个层次：一方面是事物内部的统一性、联系性；另一方面是该事物与外部事物的统一、联系。由于规律说逻辑上先验规定思维只能限定在“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等内部，因此，规律说研究充其量就只是事物内部的统一性与联系性，并没有对事物外部的统一、联系作一番分析的考察。这样一来，规律说虽然摆脱了孤立地、一成不变地看待要素时所采取的形而上学方法，却不可避免把陷入到同样是孤立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图书馆事业的形而上学方法之中。“大多将图书馆事业划分成若干基本部分，构成图书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9〕就是这种形而上学割裂事物的具体表现，与以往研究工作相比较，不同的地方在于割裂的整体由图书馆变成成为图书馆事业。况且，规律说理解的图书馆事业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与管理体制，图书馆工作的任务，图书馆类型的确定和变化，图书馆网的布局，图书馆馆际联系，图书馆工作的标准化，图书馆干部培养，图书馆研究规划等等”〔10〕，简言之，图书馆事业就是图书馆国家机构、图书馆及其管理。那么，图书馆就是图书馆事业的核心，切割图书馆事业最终仍不免就是切割图书馆，研究方法倒退了。归根结底，规律说与要素说采取的都是形而上学方法，但是，它们也还有所不同，规律说一方面“将图书馆事业划分成若干基本部分”研究，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探

索图书馆工作的规律，只是由于不理解规律究竟是什么，视线限定在图书馆现象内部，才把规律说的“规律”变成一种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总之，彻底摒弃形而上学思维，把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象上升为思想、概念，就是当下迫切要去进行的一项工作。

二：(2)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1〕，因此，图书馆事物只是一个独立的现象领域，但不是独立的、本质的社会现象，它从属于一个更广泛更本质的社会现象，即社会情报信息交流的一种形式。我们必须对图书馆和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作运动中的考察，跳出图书馆，放眼整个社会，看到现代图书馆是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而新的技术革命使社会具有了与以前不同的历史特点，图书馆现象日益地失去其独立性质，变成一个由多因素参与的过程。需要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社会，不可能单独考察思想、组织形式、物质技术条件等，图书馆活动的一切动向和发展，都处在社会的影响之下，只有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考察才符合实际，否则，分不清什么是现实的，什么仅仅是现存的。在这个时候，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也还被封闭在图书馆事业系统内，研究与思维有更加内向的倾向，众多图书馆学分支学科产生就是受到这个研究方向影响的结果。人们不把图书馆放在社会的运动中考察，相反倒把社会现象纳入图书馆现有的形式进行认识，把接触到的新或旧的科学学科生吞活剥。但是，图书馆研究的方向还是有了较明显的转换，对读者服务研究一步步深刻化，“全心全意为读者”、“读者第一、服务第一”、“满足读者一切要求的需要成了图书馆工作总原则”等，渐而形成读者服务研究潮流。一石激起千层浪，蕴藏在这个研究中的“情报交流”

新方向就要发展成主流。它是社会借“读者服务”形式表现的一种社会需要,并且迫使图书馆工作和研究改变自己存在的方式。就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社会需要有最权威的力量,如泉源,似洪炉;由这个社会需要产生的理论也同样最有权威,它作为社会理论的形态指导着变革实践。“读者服务”一定要挣脱图书馆个体束缚,融汇于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开始转到社会情报交流方面去了。

综上所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被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要素说统治图书馆学研究达四十年之久;1962年有人全面阐述了“藏为了用,用离不开藏”这对特殊矛盾,直至1979年,仍然有人按照矛盾说把横向科学管理学引入图书馆研究,探求新的特殊矛盾;八十年代初期研究工作重新采取形而上学方法,但伴随新技术革命的实践不可避免地在图书馆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受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发展的制约,图书馆自身始终是图书馆研究的一个方向,但是,图书馆研究的方向毕竟经历了“要素”、“读者服务”、“情报交流”等的进展。

三

列宁说:“哲学不能由一门从属的科学——数学——取到自己的方法”〔12〕,同样,一门科学也不能由一类社会机构取到自己的内容。以往的图书馆学却是从研究“图书馆要素”、“图书馆的特殊矛盾”、“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13〕,一句话,是从研究图书馆这类社会机构取得自己的全部规定性的。人们不禁要问,这个规定性构成了一门科学了吗?上面分析了,对要素的认识是直接的感性认识,矛盾是感性直接性的表象,而规律则倒退到要素那儿,那么,图书馆学研究历史表明,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从来也没有超过

表象阶段,事实上,由一类社会机构得到的认识也不可能超越表象阶段。由于图书馆事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就必须克服经验材料的直接、现成、散漫杂多、偶然而无条理的性质,超拔出来,进而依靠自身去发展。一方面是对图书馆各个组成部分作分析的考察;另一方面是超越图书馆自身,探索它物反映。这样图书馆就与情报所、数据中心、咨询中心同一,它们都是进行传递、交流情报的工具,为满足人们对情报的需要服务的;它们又是有差异的,即各自是情报交流过程在不同条件、不同需要下的不同表现形式。简言之,图书馆现象的本质不仅在于图书馆自身的运动,同时还在于它在情报交流过程中的存在形式,是二者的统一。

从科学学科发生的历史来看,一门科学是不能由一类社会机构取得自己全部的规定性的。“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14〕。“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15〕。“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16〕。从这些事实中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17〕,即由人类社会产业的某种需要产生的。从一类机构的直接存在中,和对这一类机构孤立研究,便构造成一门科学,它的缺陷就在所难免了。比如,对图书馆专业人员缺乏科学和事业上的吸引力;图书馆学教学主要的内容是让学生熟习当前图书馆工作过程,以“收集、登录、著录、分类、主题……参考、检索”为工作模式,有沦为适应职业需要的技术训练之嫌等。不是由社会需要决定,把社会需要排除在外,不因社会需要发生变化而变革自身,仅从“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方法”研究得到的学科确实有一点儿不科学。

因此,目前我们对待这个不够科学的学科应该做出比较科学的认识:图书馆学作为历史现象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了,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使它具备自己的特定的内容与意义。当我们对之思维研究其历史的时候,尽管思维的行程要遵循“从事后开始”的路线,即从现实社会已经获得固定形式的空间关系出发;从知识载体与图书馆、读者与图书馆出发,从时间上追溯其历史的起源和发展,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客观趋势。但是,我们的研究决不是为了否定历史、改变历史、而只是改变前人对事实所做出的不符合历史观点的认识,并在前人基础之上把这门不够科学的学科向科学方向推进。

总之,人们对情报的需要是现代图书馆、情报所、数据库、咨询中心等机构存在的根据和本质。对情报的需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表现形态,从根本上讲,它具有支配满足情报需要形式的力量,它决定了各种交流形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各种交流形式也竭力发展自身,以其不断进步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证明是本质的表现,单纯从一类社会机构存在的内部是不能产生出真正的科学的。

四

图书馆学这个名称及其特定内容是一个历史现象。作为历史的产物它已经成熟到以全新形式出现的时候了,换言之,新的技术革命的实践和图书馆现代化,把我们的研究从“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中解放出来。历史图书馆学的终结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它意味着未来图书馆科学的开始。终结也就是开始,未来则蕴藏在历史发展中,二者的交替就是社会进步。这个时候,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也要从图书馆中挣脱出来,进展到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情报交流体系。图书馆如何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变革、生存、发展,如何从自己的全新的形式和根据

出发,满足社会、集团、个人对情报交流的需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研究人们获取和利用情报的要求、能力、习惯、方式等,并与图书馆这个形式结合起来,而不是与情报所、数据中心、咨询中心结合。其次,人们获取和利用情报的要求、能力、习惯、方式等一旦与图书馆相结合,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图书馆职能转移和分化。

图书馆的职能既不是自古不变,也不会万世长存,图书馆根据其所处的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而有其不同的职能,而转移和分化也就是必然的了。目前阶段,图书馆的职能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高等学校图书馆专业基础教材《图书馆学基础》为准,图书馆具有“传递情报的职能”、“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职能”、“思想教育的职能”、“保存图书文化遗产的职能”。一般地说,社会机构的职能就是这个机构起的作用,具有的功能,里面还包括该机构必须负起责任的意思。人们对职能有从主体与客体进行考察这样二个方面的思维活动,即考察作用、功能是图书馆主体直接产生的,或者说,图书馆仅仅是客体,是中介,只是通过图书馆间接产生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说“传递情报的职能”、“保存图书文化遗产的职能”是图书馆作为主体直接起的作用,是它必须承担的责任,即举凡图书馆都保存图书文化遗产,都积极地传递、广泛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职能”、“思想教育的职能”不由图书馆主体直接产生,但图书馆作为客体对之作用甚大。事实上,这二项职能从来也没有成为图书馆出发点,并对它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进行思想教育,取决于个人和国家政权,图书馆不承担责任。或者说,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进行思想教育离不开图书资料,但降低科学文化水平和搞乱思想与图书馆没

有丝毫关系,这是事实。总之,从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区分,图书馆职能有二:一是传递情报,二是保存图书文化遗产。

图书馆研究新方向把图书馆看作是整个社会情报交流关系的一个部分,是按照情报交流的客观规律为满足人们情报需要服务的。那么,就必须把图书馆(包括图书馆职能)放在社会情报交流系统中,考察什么是现实的,什么仅是现存的。这样一来,看到图书馆职能发生变换,无论我们从实践的或者是理论方面进行认识,都能够这样说,

“保存图书文化遗产的职能”是现存的,它必将随着图书馆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以至发生某种“转移”;“传递情报的职能”是现实的,尽管目前图书馆传递情报的历史使命还被掩盖在一般流通、阅览之中,但随着新技术革命实践,随着中华之腾飞,必将日益成为图书馆工作的主流和图书馆研究的方向。理论方面的根据是“知识爆炸”,图书馆几乎无一能承担全部“保存图书文化遗产的职能”了,不管怎样努力都总有缺漏,而在实践方面,绝大多数图书馆受经费、馆舍条件限制,新书排挤旧书,遗产渐累渐失,“保存”名存实亡。文献资料被使用的状况总有一定的时间规律的,比如,十年前入藏的文献资料总的流通率就低于新入藏的。图书馆学赖以成立的传统形式的图书馆面临彻底的改造,这就是将“保存图书文化遗产的职能”转移,让“传递情报的职能”充分地在运动中展开,把95%的图书馆“保存图书文化遗产的职能”转移到特定的5%图书馆身上。因此,转移

不是取消这个职能,而是让95%的图书馆从“保存图书文化遗产”理论中解放出来,以全力实现传递情报的职能,这个意义是十分大的。图书馆的职能一旦就是传递情报,是对图书文献资料的选择、传递、利用,那么,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方法将围绕满足人们情报需要而服务,并以此为目的来改造自己。其中包括适应社会需要以改革现有工作形式和方法,研究、开拓新的服务形式。图书馆不再是一个学术性机构了,它应该成为向社会提供学术信息的服务机构。选择、传递就是学术,但传递本身还是服务,为读者(用户)服务是图书馆的根本性质。图书馆研究超出图书馆自身而与情报现象融为一体,关于这个过程的科学用图书馆学命名已不确切,而且,与情报现象融为一体的科学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它是关于把图书馆学包含在内的、以情报交流为职能的一门学问。

附注:

[1]、[15]、[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第547页、第42页、第523页。

[2]、[11]、[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240页、第240页、第505页。

[3]、[6]、[7]《小逻辑》,黑格尔,第40页、第98页、第98页。

[4]、[12]《哲学笔记》,列宁,第246页、第83页。

[5]《普遍图书馆学》,O.C.丘巴梁。

[8]、[9]、[10]、[13]《图书馆学基础》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

This article was favourably received at the 1984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t Nairobi. (page41)

Papers on the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Cataloguing Rules for Western Language Materials"

Published in 1985, the "Descriptive Cataloguing Rules for Western Language Materials" wa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cataloguing and AACR2,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rete conditions of the libraries in China. This new work in cataloguing western language materials is applicable both to MARC and card catalogue. These papers will be helpful to the usage of the "Descriptive Cataloguing Rules for Western Language Materials". (page46)

O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orientation of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Basic Library Science", a basic university teaching material written in collaboration by Library Science Departments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Wuhan University, is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article which considers this book to have serious defects in guiding ideology and consequentially to have harmful effects on present researches, as the said book confines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for Chinese library work and library science into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work", and the main point is further condensed as "to stress on investigating into the substantial constituents and technical methods of the various procedures of library work." Such cognition and practice has had influence in confining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within the library itself, thus caused the breakage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the society.

Such mode of thinking in making researches impedes the foresighted way of thinking necessary for reform, and thus hinders the progres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itself. (page77)